

第十一章

上“贼船”问题始末

“九·一三”事件前的一段经历

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中，有一个特定的词——上“贼船”。一九七一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位追随陈伯达（实质是林彪）犯了严重错误而又迟迟不认识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上作了一段批示，其中一句为“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此，上“贼船”一词在“大批判”中流行起来，它的含意是指追随林彪反党集团，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一项帽子，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以后，被戴到了我的头上。对于了解我“文革”以来历史的人们，这显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搞欲加之罪的人们又何患无辞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从“九·一三”事件以前自己的一段经历谈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后，我虽然仍保留着海军司令员、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却不参与决策。因为当时的党

委被称之为“以李、王、张为核心的新党委”;我背着“反对林彪”的沉重包袱，自然只能是一个“核心”以外的成员。一个党委、常委内部，一部分人组成一个核心，排斥另一部分人的意见，这在党的生活中是极不正常的，可此时却是理所当然。原党委常委中，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同志被打倒，受到残酷的斗争。我的处境也很困难，用林彪、李作鹏等人的话，叫做“一批、二臭、三保”，也就是说要对我进行批判，直到批臭。当然，“保”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鉴于毛泽东同志对我的保护、他们投鼠忌器。“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是当时流行的一句打油诗，用来形容我的处境，也完全不过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召开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了公开的批斗，批斗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突出政治，推行单纯军事观点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打击李作鹏等“革命的领导干部”，上纲自然要上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对此，我多次检讨均通不过。到了一九六八年，在海直机关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对我和海军其他领导干部又进行了连续几天的批斗，并在师以上单位拉线广播，有四万余人听了批斗实况，并以群众组织名义，印发了《肖劲光同志的错误言行一百三十条》。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海军党委召开了三届四次全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对海军党委“三·二”、“三·三”会议的评价问题，李作鹏说，“三·三”会议就是否定“三·

二”会议，也就是否定林彪一九六二年对海军的三条指示，就是要复辟肖劲光那套没有彭、黄的彭、黄一套。还说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三·四”会议做了决议，对“三·二”、“三·三”会议作了颠倒是非的评价。我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在会上再次受到批斗。除了检讨错误，我没有发言的自由。记得我在检讨中说了一句，“过去认为把林彪说成‘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不妥，有‘最高’难道还有‘次高’？”以李作鹏的老婆董其彩为首的“造反派”们就抓住这句话大作文章，说我仍旧坚持罗瑞卿的说法，无限上纲批判我反对林彪，反对毛主席。除了过去批判过的罪名以外，还批判我是“二月逆流”分子，因为我说过“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得好”；批判我是“肖华分子”，因为在开始批肖华同志的时候，我说过“肖华还要保”的话。“三·四”会议酝酿选举党的“九大”代表，在那种“左”的狂热情绪的支配下，在对我进行的批判方兴未艾之时，我的代表资格很自然地被否定了。为此，李作鹏等人不得不出来做工作。李作鹏说，“不选肖劲光，我们就被动，中央不会通过的。”还说，“主席讲了，党代会要有各方面的意见，‘二月逆流’的人不是还选了嘛……”董其彩则更露骨地说，“九大代表要有代表性，肖劲光是右的代表。”就这样，我是作为“右的代表”取得了“九大”代表的资格。在我的代表登记表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的立场和态度：长期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

线，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压制革命群众运动；中期也有错误……”

“协商单位意见：肖劲光同志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不具备‘九大’代表条件。有些错误过了线。但其错误性质基本上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同意他为海军出席‘九大’代表”。在“九大”开会的时候，尽管中央领导同志说过“肖劲光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就不要批斗了”的话，可是在海军组的小组会上，仍旧对我进行了批斗。我仍旧只能检讨错误。

这样的处境，我的心中是十分痛苦的，整天的检讨、请罪。何罪之有呢？自己也不明白。革命这么多年，此时却糊涂了。毛泽东同志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一个人。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我深察其中，深有体会。在我年轻的时候，是毛泽东同志带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以后的征程上，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帮助、教育和影响都是使我终身难忘的。“文革”以来，尽管自己十分不理解，却从未怀疑过，从未想过毛泽东同志会犯错误，而是虔诚地检讨自己觉悟不高，理解不了。因此，说是对他老人家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都可以。对于林彪，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我很尊敬他。一九六二年以后，虽然林彪批评我，我思想不通，林彪派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来，自己有感觉，但感到自己年纪大了，培养两个接班人，也是件好事，都是往好的方面去想。“文革”以来，由于林

彪的特殊地位，我相信他是代表毛主席的，毛主席选中的接班人，我当然不会去怀疑。所以只是自责居多，想方设法去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提高觉悟，“保持晚节”。这也是“文革”期间我说了一些违心的话的根本思想原因。当时，苦于思想上与毛主席“文革”实践格格不入，我多次写信给毛主席，检讨自己的错误，请求面见他谈一谈。我也曾给林彪写过信，也是为了检讨错误，取得帮助和教育，从而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是我当时的心情。可是林彪从来认为我是他插手海军工作的障碍，“一批、二臭、三保”，“保”是不得已的，而批臭我、打倒我才是他们的真心所在。在这一段时间，我始终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

“九大”以后，林彪接班人的地位用党章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批所谓的“左派”人物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可是，事物也正是这样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九大”刚刚开过不久，权力与野心成正比增长的林彪，便导演了一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闹剧。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和王宏坤、吴瑞林、赵启民四人一起，来到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李作鹏已先期到达庐山。我们四人一道去李作鹏的住处，形式上是日常性的来往，实际上想打听一下会议的内容和开法。李作鹏对我们说，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有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你们可以去空军看看，其他哪里也

不要去，不要乱跑。当时我听了这些话，不甚了了，不知话的由头是从哪里说起的。因自己所处的地位，也不便打听。

八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周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战备问题）。之后林彪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以歌颂毛泽东同志为主题，大讲天才问题，论证要设国家主席，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关于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听李作鹏在某次会议上说过一次，并说林彪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但在宪法起草的过程中，我没有参加过有关的会议，不了解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所隐藏的奥秘，更没有意识到林彪抢班夺权、自己要当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我只感觉到了中央内部有意见分歧，因为林彪说了“有人怀疑老三篇”，“中央委员不要迷迷糊糊，要头脑清醒”等等。第二天，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材料，为宪法写上国家主席作理论准备。这天下午，陈伯达在我们华北组的讲话越来越露骨，他提出有“野心家”、“阴谋家”，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提出“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问题便如此严重地摆在与会同志们的面前。在对毛泽东同志狂热的个人崇拜之下，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是

很有蛊惑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长期靠边站，毫不了解内情的同志。因此，大家纷纷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声讨反对派。我也发了言，内容也不外这些。

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的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之后，毛泽东同志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只是在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二百多名中央委员，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的当。会下，我曾这样想，陈伯达是一个文人，而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叶群、邱会作这些人都是军人，如果没有林彪的支持，他们是不会跟着陈伯达这样做的。那么，陈伯达后边就是林彪，这从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也能悟出一点迹象。当然，有这种想法的同志不止我一人，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批判仅局限于陈伯达，批判的内容也多是陈述理论问题。如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等等，而对陈伯达突然袭击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他们搞的一套如何有计划、有预谋，一直是个谜。这个谜，直到“九·一三”事件林彪抢班夺权阴谋彻底败露以后，才解开。

这些就是我在“文革”开始以后到“九·一三”事件以前的基本情况。要说总结经验教训的话，我的感触很深。林彪反党集团的崛起和覆没，从他们主观上讲，是个人主

义恶性膨胀，权欲熏心的结果。他们这一批曾经为党、为人民立过战功的老干部，却或以叛党叛国、或以站在党和人民的被告席上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既可耻，又可悲。这一事实是发人深省的。从另一方面说，他们能够在“文革”中推波助澜，助长党的“左”的错误，利用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同时也利用了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制造了全党、全国范围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狂热。作为我们善良的人民，是无可指摘的，而作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也卷入其中，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这说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多么重要。

对于总结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我想了许多许多。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后来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上了‘贼船’，是林彪反党集团的追随者”，竟会成了我这段历史的“总结”。

由解放干部引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的消息传来之时，我们这些老同志既吃惊，又从心眼里高兴。一方面，我们没有想到林彪会发展到为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而最终落得折戟沉沙的下场；另一方面，我们又为搬掉了心头长期压着的一块石头而感到无比的轻松。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我见到了粟裕、谭政等同志，大家兴奋地在一起交谈，都颇有

同感。谭政同志还百感交集地告诉我，他的夫人王长德同志听到林彪死了的消息，大笑一声，便去世了。这种乐极生悲的事是多么令人心酸。老同志们对林彪的倒行逆施恨到了极点，而对林彪突如其来的自取灭亡，又兴奋到了极点，才发生了这样的事。在这次会议上，我带头呼口号，拥护党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意见，同时期待着党、国家、军队从此有一个转机。

“九·一三”事件以后，作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的李作鹏被停职审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我来主持海军的工作。在领导部队积极开展批林整风的同时，海军党委常委在一九七二年初开了十几天的会，大家坐在一起，交心通气，共同总结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常委同志们都认真回顾了自己在这场斗争中走过的道路，检查了自己的思想，相互间也诚恳地交换了意见，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对跟随林彪、李作鹏犯了严重错误的王宏坤、吴瑞林同志，大家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也初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比之多年来常委内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这次会议进了一步，大家能够畅所欲言，说了心里话，气氛是比较好的。当时，作为常委一班人的“班长”，我的指导思想是借批林整风之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常委一班人团结起来，从而结束长期以来常委内部不团结的局面。接着，海军又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期扩大常委交心通气

会议的成果，通过批林整风，在更大的范围内总结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各级领导干部消除隔阂，团结起来，重整海军旗鼓。所以，在扩大会议开幕的时候，我强调了两点，一点是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重点放在“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联系实际批林彪、李作鹏对海军的破坏。一点是以大局为重，搞好团结。为了开好这次会，我提出常委同志带头，特别是参加过庐山会议的王宏坤、吴瑞林、赵启民和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揭发批判，检讨自己的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开得很热烈，同志们纷纷发言，联系海军实际批林，同时倡导“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把会议情况向叶剑英同志作了报告，叶剑英同志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

批林整风，很自然地就提出了解放干部的问题。“文革”以来，李作鹏在海军搞了以他划线的层层站队，使一大批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不少人身体都搞坏了。一九六九年林彪一号命令后，这些干部被分别送到湖南零陵、江西上饶和北京煤炭干校，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则劳动改造。“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们纷纷投诉、上访，要求戴领章帽徽，要求平反。解放干部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对这些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是非常同情的。这些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海军建设的功臣，林彪、李作鹏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往死里整。苏振华同志生病很厉害，

得不到及时治疗。杜义德同志母亲去世，三百元钱的丧葬费都拿不出来。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期间，我把干部问题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作了报告。叶剑英同志说，一些老干部要分配工作，这些人是经过几十年斗争锻炼的，有经验，还是要用。他还告诉我，解放干部工作，毛主席在亲自抓。以后，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鉴于海军干部问题比较突出，中央、军委又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海军党委常委多次研究了干部解放问题，理直气壮地展开了解放干部的工作。我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要紧跟中央的部署，要有预见性，中央现在准备做解放干部的工作，我们要做准备，跟上去。我还代表常委宣布了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受打击的干部尽快分配工作的决定。

在这时，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会议结束了。会议的主要精神是批判林彪的干部路线，团结大多数人一起工作。解放“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这个会议精神一传达，对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紧接着，毛泽东同志批示解放苏振华同志，周总理、叶剑英同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叶剑英同志还给我打来电话，专门谈解放干部问题，问海军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有多少，准备怎样解决，要我们写个报告给军委，并说毛主席、党中央在抓这个问题。我立即召集常委会议研究这些问题，布置有关部门向军委写报告。我还叫来了当时的清查办公室主任李君彦同志，让他负责把在海直机关的师以上干部

一个一个进行查对，凡属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列个名单。经过认真查对后提出了一个六十名同志的名单，常委研究后决定全部解放，首先让他们参加传达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师以上干部会议。此事，我报告了叶剑英同志，以后，又就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书面报告，得到了赞同。

三月中旬，我们通知这六十名干部参加海军领导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听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的传达报告。这些干部进入会场时，全场鼓掌欢迎，场面是很动人的。我在会上讲了话，欢迎大家回来工作，将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宣布解放。此时，全场再次掌声雷动。五年来，这些干部第一次走进这样的会议室，听这样的报告，受到平等的政治待遇，人人激动不已。我对大家说，过去的问题，记在林彪、李作鹏的账上，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海军的工作。对解放的干部，我说，有些同志过去受打击迫害，身体也弄坏了，希望这些同志对自己一分为二，正确对待过去的问题，把群众对自己的批判同林彪、李作鹏的打击陷害区别开来，不能搞什么报复，搞什么反复。以前林彪、李作鹏这样搞，我们不能这样搞。对过去与这批干部有分歧、有斗争的同志，我说，大家不应抱任何成见，要支持这些同志工作，尊重这些同志的领导。这就是我当时对解放干部问题的认识。

这次大会对海军的干部影响很大。个别不堪折磨想打

行李卷回家的同志，参加会议后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表示继续留队，把晚年献给海军事业。一些含怨离开了海军的同志也纷纷来信，要求重返海防前线，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贡献力量。恢复了工作的同志更是精神愉快，早出晚归，深入部队，积极工作。

为了加速海军解放干部的进程，党委又决定在师以上各单位成立专案审查和结论复查办公室，专门审查、甄别林彪、李作鹏设立的专案和所作的结论，使一大批干部得以解放。苏振华同志回到海军工作时，海军党委组织了干部大会，欢迎苏振华以及刘道生和杜义德同志重回海军领导岗位工作，并上报增补三位同志为海军常委。

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一时间走在了全军的前列，引起很大的反响。不少兄弟单位反映，海军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快。朱德同志、聂荣臻同志在一次会议上也对我说，你们走的步子是对的。当时，我还准备在解放干部问题上进一步放开手足，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但是，我在海军做的这些积极解放干部的工作，引起了当时分管海军工作的张春桥的极大不满。他指责我这一重大问题没有向上报告就私自决定，违反组织原则。我认真想了一下，我做的这项工作完全是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而且每一步都向军委领导作了报告，总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还几次专门指示业务部门向上报告，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至于说

没有向张春桥个人作专门的报告，这倒是事实，但当时究竟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我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尽管我从思想上对张春桥这类在“文革”中靠投机钻营、摇唇鼓舌上来的人格格不入，话不投机半句多，但在领导关系上，我还是很注意组织原则的，该请示报告的就请示报告。我据实向张春桥作了解释，说明自己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却更加激怒了张春桥。他专门找了叶剑英同志，发脾气，说他管不了海军，肖劲光不买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同志只好来做我的工作。后来，这事又告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在我访问朝鲜回国后，与我谈了这个问题，他也只好对我说，中央既是决定由张春桥分管海军的工作，还是应当注意尊重他。张春桥对我积极解放干部问题的责难，并不仅仅是由于我对他的不尊重，不向他报告，这应当与当时全国的形势联系起来看。

“九·一三”以后，解放干部的呼声很高，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潮流，由此也引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潮——人们不自觉地把林彪与“文化大革命”相联系，对“文革”的怀疑、不满、抱怨情绪比比皆是。记得在海军召开解放干部的座谈会上，受迫害的干部纷纷发言，批判“文革”中林彪及其一伙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罪行。同志们对“文化大革命”一肚子的气，溢于言表，实际上控诉了林彪、也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后来，在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上，张春桥、江青、

姚文元、王洪文都批过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们很敏感的一根神经。尽管我在做解放干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一工作的后果却客观地显示了这样一个趋势。“文化大革命”是张春桥、江青等人起家的资本，他们是决不能允许这种思潮滋长蔓延的。他们需要制止这种思潮，“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需要抓典型，指导全局。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既是走在了前头，那么，就首当其冲地遭到了迎头棒喝，我也就不可避免地大祸临头了。

两年四季八个月的党委扩大会

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央准备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所在的总参、空军、海军、总后几个大单位都编在了军委直属队小组。会前，我考虑海军是林彪插手的重灾区，李作鹏在海军究竟搞了哪些活动？为什么能把海军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党委有什么责任？有哪些经验教训？应当很好地总结一下，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一个交代，同时以为前车之鉴，所以提出海军要搞一个有分量的文件。经海军党委常委讨论研究，并报告了军委同意，便开始着手准备这个文件。在这一段时间里，常委们在一起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分析和讨论，一致认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并不是

偶然的，它并不局限于一九七一年的七、八、九三个月，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海军来说，是从一九六二年就开始的。批林要深入，必须联系海军的实际，现实和历史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同时，大家也一致感到，长期以来，海军党委与林彪、李作鹏搞的那一套是进行了斗争的，但斗争是不够的，经验教训也很深刻。这个文件，以批判林彪、李作鹏为重点，结合一九六二年以来林彪插手海军的实际情况，对林彪、李作鹏的罪行及其思想影响作了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较全面的清算，并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承担了党委应承担的责任。这个文件，常委先后讨论了八稿。五月二十日到六月二十三日，我带着这个文件参加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代表海军党委在会上作了发言。周恩来同志亲自到会听了我的发言。与会反映也是好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以下简称“四·五”会议)。按照原会议议程，准备先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然后结合海军实际批林、整风。第一步解决一九六二年以来海军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第二步海军党委领导同志整风；第三步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整风。

这个会议安排，是符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原则的。批林整风要深入，就要联系本单位实际。象海军这样

一个林彪直接插手的重灾区，通过联系实际的批林，分清是非曲直，是批林整风的必由之路。而联系实际追溯至一九六二年，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海军党委“三·二”、“三·三”会议上，由于林彪插手海军而存在着尖锐斗争是事实，“三·四”会议做出的错误结论对海军的干扰破坏也是事实。这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批林、批李，同志们联系这些问题都是很正常的。这算不算是历史的旧账？我个人认为不能算。就海军来说，“文革”中形成“李、王、张”并不是偶然的，完全是一九六二年以来斗争的继续。联系历史，更深刻地认识这些问题，使海军各级领导同志统一思想，更好地团结起来。这是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错误。如果总结经验教训的话，我考虑是不是有这样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时机尚未成熟，我们有些操之过急。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张春桥、江青的插手，会议是可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绝不会反复再三，跨了两个年头，经历了四个季节，为时八个月，从而给海军后来的工作留下了深重的后遗症。

七月于七日，“四·五”会议正式开会。会议的前一阶段，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联系李作鹏在海军的所作所为进行批林。按照原定的议程，会议开得很正常。弯子是从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转的。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

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与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同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理以毛主席指示的基调，批评了我们的会议讲历史问题过多，容易走偏方向，指出我代表海军党委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那个发言，他的印象是讲历史问题太长，讲讲是必要的，讲几页就可以了。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十分严厉。他说，从去年中央77号文件以来，明确了批林是重点、“九大”以来是重点，而你们把重点放在过去的问题上，“考古”，是指指导思想问题。对于这些批评，我当时并没有完全想通。我一直认为，海军有海军的实际情况，海军的会议联系了“九大”以前的一些问题，正是为了批林这个重点。对于总理说的，讲历史问题多了、长了，容易走偏方向，我是接受的，但对于张春桥的一些说法，我不以为然，例如他说的“这次会议给人一个印象，我很担心，搞不好海军可能出现反复。”海军从“三·二”、“三·三”、到“三·四”会议，的确有过几次反复了，为什么反复？不就是因为林彪的干扰破坏吗？“三·四”会议作出的错误决议，打击了一大批老干部，不允许反复，就没有是非曲直了。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江青、王洪文都反复强调“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江青直截了当地提出，“斗争的锋芒是对着‘文化大革

命’还是对着林彪，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张春桥还当面指责我宣布解放六十名干部，这样的大事事先不报告。我当场顶了他，说我报告过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同志。如前所述，当时，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问题，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我们在联系海军实际批林、批李，做解放干部等工作的时候，也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种主观意识，所以对张春桥、江青的这些批评，很难真正了解他们的含义。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也谈不到“深刻的认识”。我们的基本思想是，既是毛主席说我们这是纠缠历史问题，我们就只有从这方面去检查，去认识。这就是当时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

对问题的认识既是这样模糊，实际行动的盲目性是可想而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四·五”会议作了“走偏了方向”的结论，会议的第二阶段就开始纠偏——“以批林为重点”，“以‘九大’以来为重点”，于是就批判了李作鹏、张秀川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以及王宏坤、吴瑞林同志在这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王、吴作了检查，我也就前段会议走偏了方向作了检查；并结合“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自己的思想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作了发言。十月份，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周恩来、李先念、张春桥、纪登奎、姚文元参加了会议，海军常委列席了会议。叶剑英同志肯定了我们这段会议的做法，对会议的总结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与会讨论并

基本通过了这个总结报告。周恩来同志说了“会议不要时间太长，要适时结束”的话。叶剑英同志还提出，会议结束时，请沿海六大军区的负责同志来参加一下会议。因为各舰队接受他们的领导，这样做有利于各大军区了解会议的情况，回去后一起抓好落实。军委办公会议之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四·五”会议上讲了话。叶剑英同志说，他热切希望会议取得两种果实：政治思想上，在批林整风的基础上，把思想基本统一起来；组织上，使这次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海军领导班子和各级领导班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核心，从而有计划、有步骤、加快速度发展海军。李先念同志也恳切地说，军委办公会议认为，你们的会议转过来了，就好了。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向这方面做，会议一定开得好。

然而，就在会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军委召集海军常委和刚刚赶来的沿海六大军区负责人的会议。原以为是一个准备讲一讲“四·五”会议结束的有关问题的会议，不料却传达了前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指示要点，大意是中央不能批准海军党委的会议总结报告，海军的会议第一阶段纠缠历史问题，走偏了方向，第二阶段重点批王、吴，颠倒了主次。对海军四个月的会议作了全盘否定。“四·五”会议一直在军委及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特别是批了会议纠缠历史问题以后的这一阶段，会议的每项议程都直接报告过

叶剑英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段会议也作了上述的肯定。此时的反掌，我感到不仅打了我，而且殃及叶剑英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究竟怎样才算批林？不能不使我感到困惑和费解。十二月四日，军委又一次召开办公会议，讨论海军会议问题。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汪东兴等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矛头便集中在我身上了。记得当姚文元提出了“肖劲光是被林彪拉的”这一问题时，举座惊讶，周仁杰同志站起来说了一句，“肖劲光一直是挨林彪打的……”张春桥马上指着周仁杰说：“你要做检查，肖劲光上林彪的贼船是有文件的。”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因为谁也不知道张春桥所说的文件是什么。我个人亦觉得十分突然，不知他们搞的什么鬼。张春桥说，海军开了半年的会，第一阶段纠缠历史，不批林，第二阶段颠倒主次，不批林，从海军党委的领导上来管，主要应由肖劲光同志负责。他还说，肖劲光同志不是一贯正确的，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上了林彪的贼船，长期不同林彪划清界限，所以不执行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说我不是一贯正确，我接受，谁也不可能一贯正确，但对于上了“贼船”这种无中生有的说法，我是无法接受的。江青也阴阳怪气地发了言，她说“肖劲光，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毛主席那样关心你，对你感情那样深，那一年我们在青岛，毛主席到你那里要饭吃，除了你，毛主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

事哟，可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江青这个人讲话随便得很，从来不分场合，想起什么说什么。她说的这件事，是有一年夏天在青岛，我请毛主席吃饭，不巧那天毛主席感冒了，没有来。后来有一天毛主席和江青突然来到我的住处，说“你不是请我吃饭吗？”我说“是啊，我请你你不来嘛。”毛主席说，“今天我要来要饭吃了。”当我知道毛主席真的没吃饭，忙叫炊事员做饭，还请了刘亚楼作陪。江青用这个例子说明毛主席对我好，而我却忘恩负义。

“四·五”会议又被带上“颠倒主次”的帽子，拖了下来。究竟什么叫“颠倒主次”？我记得参加“四·五”会议的同志们费了很大劲去讨论。一种意见是“颠倒主次”是颠倒了批林与整风的关系，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意见认为“颠倒主次”是颠倒的重点批林还是重点批王、吴的问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颠倒了解决肖的问题还是解决王、吴的问题。可见当时思想之混乱。然而，不论是哪种意见，都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当前主要是解决肖劲光的问题与重点是批林的关系是不是也颠倒了主次。有些同志提出，解决肖的问题仍属整风范围的问题，前一段重点解决王、吴是不批林，那么重点解决肖的问题不也是不批林？问题提出以后，张春桥、江青等人反复解释说，颠倒主次主要指颠倒了重点是批林还是重点批王、吴的问题。与重点解决肖的问题不同，肖上了林彪的贼船，首先解决肖的问题是批林的组成部分。会议上不少同志还

是不理解，他们认为上述解释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有同志提出，如果说首先解决肖的问题是批林的组成部分，那么，有的人也上了贼船，问题比肖还严重，所以前段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也是批林的组成部分，也有利于深入批林，为什么说上一阶段犯了主次颠倒的错误？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激怒了张春桥和江青，说这实际上是对中央的批评不接受。压制了提意见的同志。

这以后，会议成立了以苏振华同志为首的领导小组，组织了四十多人参加的会中之会，称之为小型会议，专门“帮助”我认识上“贼船”问题。小型会议以及整个“四·五”会议都由张春桥直接抓总，实际上排斥了叶剑英同志对会议的领导。他们在会上印发了我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写给林彪的几封信和九届二中全会在华北组的发言，公布了我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投票问题，并危言耸听地提出一九六九年林彪找我与李作鹏、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一起谈话以及海军北兵南调，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等问题，作为我上“贼船”的证据。大会小会，车轮战术，历时一个多月，逼我检查交代这些问题，承认上了“贼船”。张春桥、江青多次参加了海军的会议，实际操纵着会议的进程。在揭发我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投票问题时，江青作了充分的表演。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江青、张春桥少了很多票，这使他们深为恼火，认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动向，私下布置了查票。据说，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央委

员，看到了我在选票上划掉张春桥、姚文元、叶群等人的名字，揭发了这件事。时隔三年，他们仍旧耿耿于怀。江青说，“肖劲光，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为什么不投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的票？这个问题你要很好交代。”于是，会议便反复逼我交代这个问题。迫于形势，我检查了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没有投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的票的情况。江青说，“你也没有投我的票”。我说，“我投了你的票。”因为我记得当时在投票时，对于投不投江青的票我确实有过考虑。从心里说，我对江青的反感并不亚于上述几个人，但当时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我还是决定投她一票。而江青反驳我说：“你就是没投我的票，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把票查出来了，你要不要看，你要看我现在就可以拿给你看。”江青既是这样说，我便回答说，“那也许可能吧。”江青气急败坏，“你为什么不投这些人的票，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我这才明白，江青多次指责我“对毛主席没有感情”的症结所在。对她的狭隘和卑劣，我只能报以沉默。

这一段时间，在海军这些大大小小三十几次的会上，我对会上提出的上述几个问题逐一作了说明，从思想认识上做了检查，请求大家帮助，但不认为是上了贼船，这些检查都没有被通过。我心力交瘁，每晚只能睡眠三小时，心脏病反复发作，从精神上到身体上都近乎于垮了。我逐渐悟出了他们的用意，就是逼我承认上“贼船”，从而有口实

再次搬掉他们心目中我这块绊脚石。

此时，我已被排除在会议领导之外，只是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我才得以在领导小组之中保留一个名字。我会上会下做检讨，并将自己的检讨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同志，还附信给毛主席说，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多年培养、教育和信任，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听说张春桥、江青在毛主席那里几次奏本，说我上了林彪的贼船，要求罢官，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始终不同意，说，肖劲光是个老同志，他上的什么贼船。肖劲光还要当海军司令，海军司令不要易人。周总理打电话将毛主席的这些话告诉了我，安慰我，鼓励我好好检讨错误，保重身体，并暗示我，有些问题可以先承认下来，以免被整垮。周总理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人都深刻地体会到他的艰难处境和良苦用心，深深地感激他、敬重他。当江青知道周总理把毛主席的这些话告诉了我时，打电话来又哭又闹，说，“肖劲光，我是帮助你下贼船，不是要打倒你。我在延安就是你的一个兵，打倒你我是不会同意的。”弄得我哭笑不得。

一九七三年一月份，在形势的逼迫下，我的检讨几易其稿，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贼船”。在最后一次定稿的时候，军委专门派人来拿这份检讨，说中央政治局开会等着这份材料研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反复看了多遍，最后在午夜时分才送了上去。送去后没多久，我接到总理

从政治局会议上打来的电话，告知我检讨通过了，他亲切地说：“检讨了，很好啊，我向你学习。”我知道总理有些话难于启齿的苦衷，也不多说什么了。我上“贼船”的问题就这样定了论。谎言重复一千次，终于成了“真理”。

二月二十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军委领导同志、海军常委列席会议，名曰讨论中央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示，实则是再次批斗我。这次会议是周总理主持的。面对张春桥、江青等人的淫威，总理很有策略地批评了我，也保护了我。他对我说，要以全党的大局为重，要以海军的大局为重，改正错误，做好工作。本来，会议的情况报告连同我、王宏坤、吴瑞林的检讨是准备一起下发的，总理说，报请了毛主席，批准报告下发，其他文件都不下发了。张春桥在会上似乎有些心虚，他说，会议前段批王、吴是对的，后来批肖也是必要的。有的人说，好象中央也纠缠历史，把肖劲光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给林彪的信也拿出来，这是不得已，中央一直在等待着肖劲光自己主动交代，总等也不讲，只好这样。如果他完全采取主动，“九·一三”以后与大家站在一起批林，这些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种解释也真可以算作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张春桥在会上还夸夸其谈他如何如何字斟句酌地修改了“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以中共中央（1973）10号文件的名义批转的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给我作了上“贼船”的结

论。

江青在这次会上也丑态百出，她再次重提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投票问题，“肖劲光啊，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你在九大选政治局的时候，不投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票，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查出来了，是不是啊？总理？”江青这是故意在政治局会议上将总理的军。但总理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劲光，你怎么没投毛主席身边的人的票呢？”接着总理又说，“主席是不主张查票的。”江青输了理，又胡扯别的事来。她说，你们会议有一种动向，参加会议的有一些代表海军里有能量的人认为，肖劲光的错误不是那么回事，说什么对肖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肖吹捧林彪的调子没有超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左一条右一条，你肖劲光应当站起来批驳这些话！

叶剑英同志在会上也不得不批评我几句。记得他说了一句“肖劲光你这下可开了天门了”的话，江青即刻站起来批评叶剑英说得不对，声色俱厉。我听得莫名其妙，既不知叶帅说的是什么意思，也不懂江青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有一点可以悟出，江青认为叶帅的话是包庇我。

会议开到二十一日凌晨一时结束。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我疲劳之极，也愤慨之极。我很明白这一幕戏的导演者江青、张春桥的目的就是为了整倒我。刚刚进家门，电话铃就响了，是总理打来的。总理亲切地说，“劲光同志，你要注意身体啊，要想得开些，心胸放宽些，眼光放远些。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些问题让历史作结论，我们也可以再谈……”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感动。他是怕我蒙受这不白之冤挺不住。他寓意深长的话，的确使我深得欣慰。几十年来，在党内斗争中，我几次受打击，但历史最终不都做了结论了嘛。我相信党，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改变。

我刚与总理打完电话，江青又来了电话，她兴灾乐祸地说：“肖劲光啊，今天我们用吊车把你吊下来，让你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上了贼船有什么关系，下来就是了，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这一套我听得腻透了。“老子上的那门子的贼船！”我狠狠地放下电话，忍不住大骂江青、张春桥这些善于颠倒黑白、嫁祸于人、搞阴谋诡计的党内蛀虫。就是他们把我们党搞得是非不明、真伪不辨。

这就是我上“贼船”的全过程。

立不住的“罪证”

对“四人帮”横行之时的翻云覆雨，人们已是屡见不鲜。他们要打倒一个人，就可以制造口实，强加罪名。他们为把上“贼船”的罪名强加于我，挖空心思地拼凑了几个罪证。为了澄清事实，我想有必要剖析一下这些“罪证”。

一、关于一九六九年一月，林彪找海军五人谈话问题。

一九六九年一月，我很意外地接到通知，马上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要找海军的几位领导谈话。我很诧异。这些年来，林彪操纵着李作鹏、张秀川等人在海军整我，很少与我当面交谈。“文革”以来，更是避而不见。此次应召而去，我感到突然，不知他要谈的是什么事。

当我驱车来到毛家湾的时候，吴瑞林的车子也随后到了，便一起进去，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都已在。坐下以后，林彪先当面把五个人都评价了一番，每个人都说了几句好话，也说了几句批评的话。我不清楚林彪的用意，默不作声地听着。渐渐地，我悟出了李作鹏、张秀川之间由于争权夺利矛盾已相当深，这次林彪亲自出面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林彪说，“你们李、王、张过去吃了苦头，现在吃到了甜头，不要再吃苦头了。”“你们是一个战斗集体，要以李作鹏为核心，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还说“你们这条线是信任的，另外一条线是不信任的。”林彪的这些话，是对李作鹏等人讲的。因为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我的“苦头”与“甜头”，从来都是与他们对立的，我从来也没有加入过他们的“战斗集体”，也从未被认为是他们一条线上的人。林彪对我说的则是另外一段话。他说，“肖劲光，你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在延安又挨了整，到东北以后是好的，到海军以后的一段时间不好了”，“在突出政治问题上，你是反对我的。”他还说，

“你要管大事，不要管具体的事了，具体事情让李作鹏去管，你要支持李作鹏的工作。”中心意思是让我交权，支持以李作鹏为核心。我表了态，一是承认自己过去犯了错误，作检讨；二是表示支持李作鹏的工作。这种表态，当时是不得已的。现在想来，当时正值“九大”前夕，林彪要当法定的接班人，必须巩固他的阵地。海军是他多年苦心经营的阵地之一，而李作鹏等人内部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势必削弱这个阵地，进而削弱他向党进攻的力量，因此他要亲自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我去参加，主要是因为我是海军党委书记之一，是海军有影响的老同志之一，让我交权，让我支持李作鹏，使他在海军的阵地更巩固。很清楚，这丝毫不能说明我是林彪线上的人，恰好说明我不是他们线上的人。谈话以前是这样，谈话以后仍旧是这样。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直到参加“九大”，我是海军“右的势力的代表”，以后林彪搞反革命阴谋政变，以及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我始终是一个被批斗的对象。其实，对于我当时的处境，江青、张春桥完全了解，只不过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牵强附会，信口雌黄罢了。

二、关于“九大”选举政治局时，不投“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票的问题”。

张春桥、江青居心险恶地把这件事与李作鹏在“九大”期间布置选举的事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的两回事。“九大”期间，李作鹏是布置过选谁不选谁的问题。据舒积成同志后来揭发说，“九大”时，李作鹏曾在海军代表中点了所谓参与“二月逆流”的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同志的名，布置海军参加“九大”的十七名代表中的八名基层来的同志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不投这些领导同志的票。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李作鹏也不可能让我知道。所谓没投“忠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票”的问题完全是我个人的事。“九大”选举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我没有投票选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据江青讲还包括她）等人的票，是因为我认为无论从那一方面讲，他们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对他们不放心，不愿选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去论及它的是非曲直。但这件事却足以证明在“四人帮”横行之时，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被破坏到什么样的程度。本来选举是无记名投票，选谁不选谁完全是党员的权利。江青、张春桥却搞查票勾当。他们用什么方法把我的票查出来的，我不得而知，但手段之卑劣却可见一斑了。

三、九届二中全会在华北组发言问题。

九届二中全会我在华北组的发言的确是赞同了林彪的发言。这是在陈伯达散布了五大谎言之后，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崇高信仰而上当受骗的。不仅是我，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轻信了。我在发言中主要称赞了林彪讲的毛主席在

三个关键时刻“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弱为强”的说法，这也是出自参加革命数十年在几次革命的紧要关头的亲身体会，表达了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之心。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与支持林彪政变根本沾不上边。如果这算上“贼船”的话，那么，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可带上这个帽子，岂不荒谬绝伦。我举一个例子，在陈伯达散布五大谎言的时候，当他讲到有人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天才，说了一些贬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的话时，我还插嘴问“谁讲的？”以为是国外的反动势力。当醒悟过来是党内有人说的时，会下又拦住汪东兴问是谁讲的这些话。可见我当时不了解情况的程度。

四、关于“北兵南调”（或“七九”作战方案）问题。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国即将在联合国获得合法地位，台湾方面反响强烈，在我东南沿海时有大大小小的挑衅和骚扰活动，还有敌情通报说，台湾搞了一个中兴 9 号演习，以我福建沿海为目标，用一二个师的兵力演习登陆。于是，中央军委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布置备战。李作鹏参加了军委办公会议，回来便提前吹了风，由分管作战工作的副司令吴瑞林牵头，潘焱参谋长具体负责，作战部的几个同志昼夜加班，搞了一个作战方案。方案以东南沿海为敌主攻方向，以东海舰队为主，准备必要时将北海舰队的舰船向南调，南海舰队的舰船向东调，支援东南沿海的作战。因为海军的会议是七月九日开的，后来便把这个方案称为

“七九方案”。七月十三日，毛主席签发了军委《紧跟形势，加强战备》的指示，为此，军委召开小型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单位都带去了作战方案，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全军的作战方案。此期间，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多次给予了具体的指示。

关于这件事的具体过程，我并不很清楚，是潘焱同志在那里具体搞的。但是，毛泽东同志签署的电报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战部门报告过我。海军的作战方案，我也参加了研究，这完全属于正常的军事行动。然而，这件事在“四·五”会议上被危言耸听地说成是“北兵南调”，支持林彪在南方另立中央，并把责任强加在我的头上，成为我上“贼船”的一个“罪证”。后来，这个问题写入了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以中共中央（1973）10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牵连了海军的一批干部。潘焱同志为此受到多次不公正的批判，而且殃及了总参谋部、空军及沿海几个大军区的一批人，造成很大的恶果。

其实，所谓“北兵南调问题”，完全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的一个正常的军事行动，它与林彪反革命政变并没有联系，只是在时间上巧合。张春桥、江青抓这个问题作为我上“贼船”的罪证，是根本立不住的。

五、关于顶撞中央领导问题。

这个问题，当时主要指的是在三座门召开的军委办公会议上，张春桥指责我解放六十名干部事先不报告时，

我顶撞了他。这在前面已经论及，也没必要赘述。我想说明的是，在我的心目中，确实没有把张春桥、江青这些人放在眼里。倒不是因为他们资历浅，主要是对他们不信任。举一例子。“九·一三”以后，江青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在青岛有人监视她，企图谋害她。我深知江青的为人，喜欢小题大作，无事生非，政治水平很低。便将此事通知北海舰队，让他们调查一下。一九七二年五月，北舰调查组报告说，问题已查清，根本没有所谓监视和谋害的任何根据。江青所说在栈桥有人监视她，经查，原来是一老人在那里钓鱼，根本沾不上边。而所说在太平角的蓄意谋害问题，是一个工地在爆破石头，江青硬是无中生有地说这是对着她来的。于是，我便向江青作了说明了事，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我甚至流露了作为中央领导人不要捕风捉影地追究这些问题的意思。这当然也会引起江青的极大不满。

在“四人帮”时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尽管这些罪证立不住，但他们可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置我于死地。他们就是这样给我强加了一个上“贼船”的罪名。“四·五”会议以后，我被免掉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苏振华同志接替了，并任命他为海军第一政委。

至于说 I 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写给林彪的信，内容都是检讨自己的错误，请求帮助，是迫于当时形势的产物，也完全构不成上“贼船”的罪证。

一个终生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在晚年的時候被戴上这

样一顶帽子，心里是十分痛苦的。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的问题仍迟迟不能解决。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逐步恢复，我便产生了再次向中央申诉的念头。一九七八年八月，我患了心肌梗塞，病情垂危，当我清醒过来之时，意识到自己或许将不久于人世了，我不愿意带着这样一个政治结论去见马克思。于是，扶病上书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要求把“四人帮”强加给我的上“贼船”的罪名推倒。叶副主席很快给予了批示，他建议请邓小平同志考虑“肖劲光同志是一位很老的同志，信上所提问题应予重新考虑，作出正确结论”。邓小平同志也很快给予了批示，“同意叶帅意见，请国清同志办理。”这样，总政治部便开始调查处理我的申诉。但是，在平反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当时主持海军工作的那位主要领导同志的阻挠，平反工作一无进展。一九七九年一月，我再次心肌梗塞，病势更为沉重。我不得不再次提出平反问题。邓小平同志专程到医院看望我，进一步了解我的问题的情况，他对我说，好好养病，你的问题一定给予彻底平反。后来，陈云同志亲自过问了我的平反问题。他针对当时海军给我作的平反决定中尚留一个“先受林彪打击，后在林彪淫威下犯了一些错误”的尾巴，给邓小平同志写信，阐述了“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而且要说明七二年到七三年的会议，肖劲光是

受‘四人帮’迫害的”意见。并说“十大时，总理在人大会堂检查窗帘是否露光，当时见到肖劲光，总理对劲光说，‘你渡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肖劲光是受害挨整的。”

就这样，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关怀下，一九七九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一九七九年）十九号文件，决定撤销一九七三年中央十号文件，并明确指出，“肖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贼船’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我的所谓上“贼船”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